

三国时期中国经济格局的变化

陈小赤

(陕西理工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摘要 东汉以后,相对安定的南方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三国时期,地处长江流域的蜀国和吴国励精图治,发展经济,与已经得到充分开发的黄河流域的曹魏相抗衡,充分显示出长江流域巨大的发展潜力,同时也拉开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序幕。三国时期是中国的经济格局发生变化的重要阶段。

关键词 三国时期; 经济格局; 变化

中图分类号 K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936(2014)01-0043-04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虽然到宋代才得以完成,但其开端可追溯到东汉三国时期。东汉末年以来,天下大乱,尤其是北方受战乱影响更大,经济破坏严重,“无数破产农民失去土地,变为流民……农民自农村中被抛掷出来的现象,成为最严重的问题”^[1]。而南方相对较为安定,南北方的经济差距开始缩小。三国时期处于长江流域的蜀国和吴国励精图治,发展经济,能够与黄河流域的曹魏相抗衡,已充分显示出长江流域巨大的发展潜力,同时也拉开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序幕。这一时期巴蜀和江南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扩展的起点,中国的经济格局开始发生变化。

一、东汉以来南方经济的发展

东汉时期,北方经济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几乎发展到饱和状态,并且开始出现衰退迹象,而南方经济却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这也为以后三国中的吴、蜀割据奠定了经济基础。

在两汉之间的大战乱中,北方大批人民为逃避战乱,举家南迁,使南方汉族人口大量增加,并且把北方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带到南方,使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在南方得到极大推广。从而使南方相对较厚较硬的土层和河网沼泽地区的开发,得以实现。由于当时南方的许多少数民族中,有的甚至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这一生产技术的提高,其意义就更为重大。

当时南方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水利与农业的发展。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东汉时期南方水利工程技术上的进步与创造,突出表现在马臻治理镜湖上。顺帝永和五年(141年),会稽太守马臻治理山阴(浙江绍兴)镜湖,筑大堤350里,会合东南诸山泉36源,贮蓄在湖内。湖高于田,田高于海,沿堤设斗门堤闸,水少则泻湖水溉田,水多则闭湖而泄田水入海。溉田达九千多顷,以后一千多年不受水旱影响。此外,东汉下邳徐县北的蒲阳陂、庐江的芍陂等水利工程都体现了较高的水利工程技术。^{[2] 262}

东汉时南方水稻的栽培技术也有明显进步。其一是稻秧的移栽技术。《四民月令》载“三月可种粳稻,……五月可别稻及苽,尽夏至后二十日至。”这里“别稻”即指移栽水稻。水稻秧苗的移栽,不仅便

收稿日期 2013-09-23

修订日期 2013-11-12

作者简介 陈小赤(1969-),男,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与汉水文化研究。

于集中管理秧田,节约灌溉用水,并且便于除草。其二是出现双季稻的栽培。东汉杨孚《异物志》即言:“稻,交趾冬又熟;农者一岁再种。”生产技术的提高,使资源本来就丰富的南方在农业产量上,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其耕地面积也大量增加,从而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

二是人口的增长。根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等资料可以看到,东汉时,南方主要的三个州中,扬州人口从西汉的320多万,增加到430多万;荆州从350多万人增加到620多万;益州更是从470多万人增加到730多万人,成为当时全国人口第一的大州。相反,北方人口在这一时期却普遍减少,比如关中的三辅地区,人口从西汉的240多万锐减到50多万;兖州人口从780多万减少到400多万;幽州从390多万人减少到200多万;并州更是从330多万人减少到70万人。^⑧《地理志》^⑨《郡国志》南方人口的增加既是经济发展的原因,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三是手工业的发展。东汉时期南方手工业发展的最大亮点是发明了真正的瓷器。今天在浙江、安徽、江苏、湖南、湖北等省,都发现有东汉的瓷窑和瓷器。东汉瓷器有青釉瓷和黑釉瓷两种。在浙江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发现青釉瓷和黑釉瓷,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东汉墓中都出土过黑釉瓷。特别是上虞县文化站收藏的一件东汉末期的青瓷四系罐清润如玉,可以充分说明东汉时烧成技术特别是在还原焰的操作上,已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是一件成功的早期瓷器代表作。^⑩而益州手工业更为突出,益州的蜀锦当时全国驰名,益州用天然煤气煮盐,产量提高了一倍,益州的漆器精美绝伦,也是全国之最。东汉时扬州的造船业也有了显著进步,能够制造出乘数百人的大船。

东汉时南方经济的发展,使我国资源更为富饶的南方得到了有效开发,谱写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第一章,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三国时期吴、蜀的经济措施与经济发展

三国时期虽然群雄割据,战争不断,但各国为了图强自保,甚至战胜对手,都在想方设法发展经济,尤其是实力相对较小的蜀国和吴国更是不遗余力,奋发图强,他们对长江流域的开发使得南方经济有了较快发展,南北方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吴国在孙权统治时期,经济有显著发展。同曹魏一样,东吴也推行了屯田制度,并分为民屯、军屯。民屯主要集中在吴郡、会稽、丹阳地区,其中毗陵(江苏武进)最大,有数万人在此耕种。军屯则更为广泛,凡有军队驻扎之地,都有军屯的设置,而重点集中于长江南北,其中庐江(安徽潜山)规模最大。吴国屯田时间较长,从203年一直延续到280年,几乎与吴国政权相始终。而且吴国的屯田与水利开发并举,比如在太湖屯田区建东南海塘,修太湖东缘湖堤,开凿塘河,整治江南运河等。更为难得的是无论屯田还是水利建设,几乎都是开拓性的而非重复性或恢复性的,而正是这些开拓性的工作,奠定了江南农业和水利发展的基础,为江南地区的初步开发、江南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吴国的屯田和水利建设使江南地区的耕地面积显著增加,加上北方人口的大量涌入,江南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农业方面,出现了“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⑪吴失的繁荣景象,在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其四野畛畷无数,膏腴兼倍”^⑫卷五吴都赋。有些地区的水稻每年可收两季,亩产达六斛^⑬钟离牧传。太湖沿岸和钱塘江流域是最富庶的地区,这里的吴郡、吴兴和会稽称为“三吴”,不仅农业发达,手工业也很繁荣。东吴的手工业以冶铁、海盐、纺织、制瓷、造船业为主。三吴地区出产“八蚕之绵”。武昌冶铸业最为发达,曾造千口剑、万口刀。制瓷业的中心在浙江地区,吴国瓷器制作水平在汉代彩陶的基础上有显著提高,瓷器的胎质、釉色、纹饰以及烧制技术都臻于完善,尤其是青瓷制造技术更为成熟。由于海战和水运的需要,吴国的造船业最为发达,长江中的战船上下五层,可容纳士兵三千人。大海船长二十丈,载重万斛。孙吴多次派遣万人船队北航辽东,南通海南岛。吴的首都建康是一个繁华的都会,商业也很发达。

蜀汉在魏、蜀、吴三国中国土最小,人口最少,其经济实力也最弱。特别是刘备夺取益州之战中,由于刘备与原益州的统治者刘璋进行了将近三年的战争,致使益州百姓“饥膏草野”。而且魏、蜀、吴三国间的争战又一直不断,这些战争,大量地耗费了蜀汉的人力、物力、财力,严重地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对蜀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诸葛亮在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后所面临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经济

河网沼泽地得以更好的开发。这一切都促使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巴蜀地区的日益成长和长江下游吴的新兴昌盛,使巴蜀地区和江南地区成为与残破的黄河流域经济区相抗衡的力量,这也是三国鼎立的经济基础。

正如前面所说,三国时期由于吴、蜀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使南方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也进一步改变了以前黄河流域经济一枝独秀的局面。但由于蜀国政治军事决策上的失误,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重心依然在黄河流域,所以当地处北方的魏国在三国争霸的过程中,也积极采取一些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使北方残破的经济逐渐得到恢复以后,北方经济重心地位的优势再次显现出来,并最终形成了三家归晋的局面。

蜀国偏居西南一隅之地,主要地区仅限于巴蜀汉中等地,是三国中最为弱小的国家。但蜀国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四川地区优越的经济环境也可以为蜀国提供稳固防守的条件,如果当时能够真正联合吴国,协调一致对付强魏,并且将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的资源开发出来,蜀国的经济实力必将大增,以后逐鹿中原的机会自然也大了不少。但就在蜀国发展势头最好的关键时刻,首先是刘备为了兄弟之“义”,不顾国家大义,举全国之力讨伐自己长期以来最为重要的同盟者吴国。意气用事的结果是兵败身死,且国力大为削弱。随后,诸葛亮为了报答对先主刘备的知遇之恩,表达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心,不顾“益州疲惫”、国力不济的实际情况,过早地发动了所谓复兴汉室、统一天下的北伐战争。而在一次次不切实际的北伐战争中,耗尽了蜀国的民力、财力。诸葛亮死后,才能不及诸葛亮的姜维依然坚持北伐,再加上后主刘禅的庸懦无能,蜀国的灭亡就在所难免了。而蜀国一旦灭亡,唇亡齿寒,和它相互依存,互为犄角之势的吴国也就很难和实力本身就很强的北方政权相抗衡了。

当然,三家归晋除了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经济方面,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重心依然在黄河流域,所以当曹魏在北方招徕流民,大兴屯田,劝课农桑,兴修水利,黄河流域的经济即得到很好的恢复,“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12] 食货志。迅速改变了东汉末年那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13] 蒿里行的凄惨景象。当年被董卓焚毁,残破不堪的洛阳城到齐王曹芳时已是“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会利之所”^[14] 胡服传。重新成为经济、政治中心。

黄河流域经济的恢复,使它仍比巴蜀和江南地区占据优势,为后来西晋统一全国奠定了物质基础。但长江流域能够支持蜀汉和东吴两个政权与黄河流域的曹魏相抗衡,表明东汉以后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也显示出长江流域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序幕已经悄然拉开。政治上风云际会,军事上波澜壮阔的三国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格局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

[参 考 文 献]

- [1] 王仲荦. 三国时期的经济发展 [J]. 历史教学, 1956(10).
- [2] 朱绍侯, 张海鹏, 齐涛. 中国古代史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 [3] 班固. 汉书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 [4] 范晔. 后汉书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 [5] 叶宏明, 曹鹤鸣. 关于我国瓷器起源的看法 [J]. 文物, 1978(10).
- [6] 杨明照. 抱朴子外篇校笺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7] 萧统 编, 李善 注. 文选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8] 陈寿. 三国志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 [9] 常璩. 华阳国志 [M]. 济南: 齐鲁书社, 2010.
- [10] 梁方仲.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11] 齐涛. 中国古代经济史 [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9.
- [12] 房玄龄 等. 晋书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 [13] 曹操. 曹操集 [M].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5.
- [14] 曾建忠. 三国屯田、农田水利中的经济地理 [J].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9(4).

[责任编辑: 朱 飞]